

面面铜锣里,满满改革声——

探寻新中国资本市场的“速度与激情”



1990年12月19日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上海浦江饭店内。它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图为上海证券所外景。

黄浦江畔,外白渡桥边,有一幢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这里曾是著名的浦江饭店,更因是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旧址而闻名,如今以中国证券博物馆身份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这里,人们可以“遇见”一面面珍贵的铜锣,“倾听”它们讲述新中国资本市场之“变”。

第一面铜锣,锣面直径约为50厘米,黑色主体上装饰着一个金色的圆圈。这面花600元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见证了新中国资本市场开启宏伟征程。

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悄然起步。股票,这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消失多年的概念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1984年7月,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股份制企业,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300万元股票。

同年11月14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这种纸质股票没

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开售当天,每股金额50元、股份总额1万股的“小飞乐”股票就被一抢而空。

“婴儿时期”的股份制改革伴随着“姓社姓资”的争议,甚至引发了对于是否会动摇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将一张“小飞乐”股票作为回礼赠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一举动,不仅向世界宣告“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也给襁褓中的新中国股市以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新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原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经理谢荣兴至今清楚记得股票市场刚开始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时人们对股票这一新生事物充满了热情。但在交易所成立之前,股票交易都是通过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手工进行,有时过户手续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严重影响了交易。市场各方对于可实现集中清算、过户的交易所充满期待。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在浦江饭店里呱呱坠地。

这面来自旧货市场的铜锣,为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敲响了第一记开市锣声,声音并不洪亮却如石破天惊,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正式利用股票市场这一工具发展经济。

上交所开业当天,谢荣兴在营业部门口挂起了两个大气球,用大红标语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上交所的诞生,用新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以往柜台交易的分散、不透明、交易成功率低等弊端,也使得‘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交易原则以及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得以实现。”谢荣兴说。

彼时的中国股市堪称“全球最小”市场: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上交所开市首日成交1016万元,其中股票成交仅为49万元。

当年的这面铜锣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它开启的是世界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由“老八股”起步的中国股市,用了短短30年跻身全球资本市场“第一梯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票现货市场。

截至2021年4月20日,沪深两市拥有4281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近80万亿元人民币。贵州茅台、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等7家公司总市值超万亿元,138家上市公司进入“千亿阵营”。

1997年,伴随上交所迁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面铜锣光荣“退休”。

第二面铜锣,目前暂时无缘在中国证券博物馆见到,因为它正在亚洲最大的无柱交易大厅“上岗”。但我们能从博物馆保存的文献资料所展示的新中国资本市场诸多“高光时刻”中发现它的身影。

2014年11月17日,这面铜锣以一记响亮的开市锣声,开启了联通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沪港通,为新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树下重要里程碑。

比照沪港通模式,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启航。

截至2021年4月20日,沪深港通北向资金净流入近1.34万亿元人民币,南向资金净流入近2.13万亿港元。依托开创性的互联互通机制,A股市场逐渐成为全球资本“标配”,内地投资者也得以投资香港市场优质上市公司群体。

“沪港通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资本市场解决了对外开放和互联互通的常态化问题。这样的一种创新,会让中国资本市场越走越远。”全程参与沪深港通的港交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说。

第三面铜锣,高178厘米,宽124厘米,锣面直径80厘米,锣架上镌刻有仿商周时期青铜器典型纹饰云雷纹。锣面上的抬头牛纹饰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2019年7月22日”等标识和字样,都表明着它不同凡响的身份。

“这面只使用过一次的铜锣,见证了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落地的重大时刻。”中国证券博物馆副馆长金星说。

成功运行20多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显现“短板”:传统行业占比过高,

代表产业转型方向的新经济比重偏低。受制于既有上市标准,许多尚未盈利或设置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创新企业以及注册在海外的红筹企业,无法在关键时期在本地获得融资支持,不得不转身谋求海外上市。

在这一背景下,为支持科技创新“量身定制”的科创板横空出世。

“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科创板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创新,成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摇篮’。”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

从2018年11月5日首度宣布“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家公司集体上市。在金星看来,259天打造的科创板成就了新中国证券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更彰显了中国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速度与激情”。

截至2021年4月20日,科创板共迎来26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3.4万亿元。伴随一批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相继登陆以及首家红筹企业、首家“同股不同权”企业、首家未盈利企业次第登场,中国资本市场生态正逐渐“重塑”。

“科创板助推科创企业跨越式发展,提高科创人才激励力度,令科创成果得到强化,也为专业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投资科创企业提供了良好的选择权。”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说,科创板的上市包容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品牌示范效应正逐步显现,为科创企业和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除了上交所开市铜锣和科创板开市铜锣,人们还可以在中国证券博物馆见到另外几面铜锣,包括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首个场内金融衍生品上市时使用的开市铜锣。

这些铜锣曾在不同时间、场合鸣响,记录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

如今,它们虽然成为藏品,但与正在各大市场“服役”的铜锣遥相呼应,共同见证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成长、改革和开放。

据新华社

怒江州:

高山种重楼,良药治“贫疾”

肖志军一早带着5位村民上山,清理林下的杂草灌木,为种植中药材重楼开垦合适的土地。

“从找合适的地方开始就要手把手教村民,林下庇荫、缓坡多水的地方最好……”52岁的肖志军是重楼种植“土专家”,来自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银坡村,研究种植重楼已10年有余。

重楼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为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而对于峡谷山民来说,发展重楼产业也成了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良方”。

怒江州98%以上土地为高山峡谷,贫困发生率曾高达56%。肖志军从小生活的银坡村藏在怒江大峡谷的山坳里,长期交通不便,群众生活贫苦。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入不敷出,

5毛钱的圆规和2.5元的学费都拿不出来,我小学就只得辍学了。”肖志军说,他辍学后肯吃苦、善动脑,从放牛羊到搞运输,再到拉砂石、做建筑……走出大山在外打拼多年后,生活渐有起色,归来时已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

“山上明明有很好的资源,可村民们却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回忆起儿时进山采药的经历,有了财富积累的肖志军打算回乡创业做“山的文章”。

海拔1800米至3100米,山上到底该种什么?“中药材重楼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野生重楼越来越少,市场缺口大、前景广。”肖志军尝试草果种植失败后,吸取教训向专家咨询,经过市场调研后,终于认准了方向。

“散户种重楼,一缺技术、二没资金、三没渠道,从幼苗到长成在自然条件下

要七八年时间,经济见效慢,村民种植意愿低。”肖志军说。

克服传统种植的“小散弱”才有奔头。肖志军投入上百万元资金,成立泸水银坡春灵种养开发基地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村党总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共同参与,既调动了贫困户的积极性,也让大家很快尝到了甜头。

52岁的村民杨学荣家曾是建档立卡户,过去常年奔波在外打工。“现在不用出去干活,在重楼基地打工就有工资,年底还有分红拿。”杨学荣笑着说。

肖志军的努力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老窝镇代镇长和继生说,结对帮扶的广东省珠海市注资200万元扶持重楼产业发展。2012年至2014年间,肖志军及其团队在相关部门的协调帮助下,外出“取

经”系统学习重楼种植和管理技术。

建设苗圃、拉遮阴网、架设管线、改良土壤……2015年,学成归来的肖志军改变之前粗放的种植模式,尝试标准化仿野生重楼种植。2016年,基地重楼种类达6种,成活率90%。穷山坡成了“聚宝盆”,肖志军逐渐被当地群众称为“重楼大王”。

“只要村民有意愿,我们就传授技术和提供免费种苗,有合同保障,收购价格上不封顶、下有保底,不愁卖。”肖志军说,目前,银坡村上百户村民都种植了重楼,每年7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能拿到重楼种植分红款4.8万元,持续了3年。

近年来,肖志军的身影活跃在峡谷高寒山区的村村寨寨,无偿向群众传授重楼种植技术。2016年至2020年,肖志军在怒江州9个乡镇推广重楼种植,为农户补贴种植资金,共带动4772户农户种植重楼3000多亩,其中建档立卡户3682户,增加群众收入300多万元。

高山种重楼,良药治“贫疾”。“巩固发展好重楼、黄精、石斛等中药材种植,以及独龙牛、黑山羊养殖等为一体的生态产业,带领村民们继续致富。”肖志军有了新愿望。

据新华社